

中国社会生活方式转型取向

王 玉 波

由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向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是不同时代的不同质的生活方式类型之间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向现代社会生活方式转型的走向是:由依附型生活方式向自主型生活方式转变、由封闭型生活方式向开放型生活方式转变、由僵固不变的单一生活方式向不断变动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方式转型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从总体上看,转型尚处于初期阶段,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依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王玉波,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当前,我们几乎人人都感受到了社会生活变化万千的冲击、震荡。随着我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的转型,社会生活方式也正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这一转型,则不同质的社会生活方式类型间的更迭、演化,是一次历史性的跨越,它势必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每个人都面临这一变革的挑战。

那么,这一转型,究竟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它的价值取向、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呢?

我国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大体包括下述三个方面的转变:

一、由依附型转变为自主型

我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为重心的伦理型社会(或者说是“人情社会”)。人们在传统的以家长制的家族伦理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的束缚下,尚未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主体地位,没有形成完全的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总是把对家族的认同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依靠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来获取生活资源和社会地位。因此,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通常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只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群体,主要是以家长为首的家族身上。在政治生活中,则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兴亡,寄托在“明主”、“清官”身上。向现代社会生活方式转型,就是要变革这种依附型的生活方式。

依附型的生活方式,是与人的发展水平的特定阶段相联系的。变依附型生活方式为自主型生活方式,人的发展水平必须进入相当高的阶段。

迄今为止,人自身的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自然个体的人时期。在从动物演进为人的过程和刚刚进化为人时,是人十分稚嫩的幼年时期,人不是独立的人,紧紧依赖自然,在大自然的锁链下生存。这种生活条件,使人还不能把自己从周围的自然界中划分出来,还不会对自然与人做质的区分,不会把主体与客

体区分开来,不会把物质与观念区别开来,不会区分物质与物质的不同特性。这种意识的“浑沌”阶段,基本上不存在自我意识、主体意识,不但谈不上自主的生活方式,还没有完全摆脱动物式的生活方式。

第二阶段,是群体性的人时期。自然个体的人,依赖群体性的生产、生活活动,逐渐形成和发展了征服自然的能力,与此同时,扩大和密切了人际交往,人逐渐把自己与周围的自然界区分开来了。但这时个体的人,仍然十分软弱,在严酷的生存斗争中,只有依赖群体,才能生产、生活,才能得到生存和繁衍后代。个体的人所依赖的群体,从我国历史来看,先是依赖氏族,后是依赖民族分化的宗族,以后又依赖从宗族中游离出来的家族。这样,人所紧紧依赖的群体逐渐缩小,不过,个体仍然难以摆脱这种依赖。中国古代从宗族制演进为家族制时,个人开始有自己姓名,这表明个人的标志出现了,自我意识从此出世了。但是,由于家世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家族利益决定个人利益,个人名字是与家族世系相联系的。所以,那时个人的名字,首先是对家族社会地位与权利的一种认定,其次才是认定个体的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因此,这时的个人也还不能把自己与宗族、家族完全区别开,不过是把自己看作是家族中的一分子,而不是独立于家族的个体。换句话说,这时的人,只看到个体与群体有量的区别——分子与整体,没有看到个体与群体有质的区别,即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自我。这说明个体的人还没有真正形成主体意识。但是,自从人有了自己的姓名,能够从量上区分个体与群体后,比远古时的人大为进步了。不过,即使有了姓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的群体意识仍淹没着自我意识、主体意识。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体,不是个体的人,而是个体所在的群体。所以,中国传统社会中,“国之本在家”,连法律也不是以个人为单元,而是以家族为单元,实行荫庇或株连,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一阶段的人是群体性的人,而不是个体的人。

第三阶段,个性个体的人时期。个体的人是相对于群体的人而言。个性是个体的生物特征、心理特征、社会性特征三者的统一,是先天生因素与后天形成因素的统一。当人还是群体的人时,人的个性受到压抑,得不到发展和表现。因此,群体性的人,并不是个性化的个体。由群体性的人,进化为个性化个体的人,是人的发展过程的一种质的升华,是人的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一升华和发展,是以个体的主体意识、自由意识、人格意识的形成、发展为基础的。人本来不仅是群体的个体,而且是在社会中独立的个体,人对周围的环境和一切客观事物乃至自己的过去,都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向往自由——自己支配自己,而不是受他人的支配,成为人的本性。而自由是个性的基础,以自由为基础的个性,就是个体的人的主体性。没有自由、没有个性,人在群体中只有从众性、机械的重复性,在传统社会的家长制家庭中,不可能有主体性,在那种环境、条件下,也难以形成主体意识。主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由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世界市场形成了,交通也高度发达,人打破了狭隘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在群体中的人,是狭隘的生活环境的人),扩大了活动空间,增强了流动。社会分工的发展,也使人的社会联系广泛化、社会关系复杂化、社会角色多样化。这一切,就使个体的人不再终生固着于初级社会组织的家族和狭小的乡里之中了。个体越来越从多种社会角色中发现了自我,越来越成为复杂的社会联系、社会关系的主体。而社会的发展也使社会组织复杂化、高层次化,不再以家为国之本,不再以家族为社会生活重心,家庭、国家也由专制型逐渐演进为民主型。这一切,使个体的人从群体的蛹壳中蜕化出来,成为个性化的个体、成为具有自主意识的自主活动的主体。一是在上述变化的同时,随科学技术进步和文化教育的发达,人的知识、智慧和能力空前提高了。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机制,又促使人们

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增强活动能力,这使人的才能日益全面发展,个体的自由活动能量不断提高。从而个体的自由意识、主体意识得到形成和不断强化,人日益成为个性化的人、成为具有独立人格自主活动的人,个体越来越能够以独特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主体的自我价值。随个性的丰富、发展,个体简单地摹仿他人的活动日益减少,自己创造性的活动日益增多,人也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成为更高类型的人。在人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人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地随之发展演化。由于主体意识的形成、发展,个性化的个体的人,在所有活动中,不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以及人际交往中,都日益凸出其个性,越来越成为在生活领域中自主的个性。因此,人的生活方式是自我取向、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调节的创造性、个性化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比依附型生活方式更高类型的生活方式,是人和社会发展成熟程度和文明程度提高的一种标志。

个性化的自主的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它是个体与群体相互牴牾的生活方式。人的个性化与主体意识的发展,是与人的高度社会化、人的社会联系、社会关系高度发展分不开的。而人也只有真正成为个性化、主体性的人,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社会性,才能正确地掌握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当人还是狭隘的群体性的人时,囿于自己所在的小群体的利益,排斥、破坏它群体的利益,往往导致暴力冲突,它表现为远古、上古氏族、宗族间为血缘亲属而进行的血腥的复仇和直到近代乃至今天还有时发生的家族间的械斗。只有人的高度社会化,才能促进人类文明素质、道德水平的提高,人的社会联系、社会关系的发展,才能使人越来越认识到人的共性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所以,个体个性化的自主的生活方式,不是以妨碍他人个性化的自主生活方式为条件的。恰恰相反,是以人人都得以自主自由生活为条件、以人人都具有自主权利的民主法制为保障的,是以人越来越具有高度的人性和人的理性为基础的。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以否定人的社会责任、社会义务为前提的。恰恰相反,它是自主权利与社会义务的统一为前提的。

二、由封闭型转变为自主型

我国传统生活方式是封闭型的。

首先,它表现为经济生活是封闭的。传统社会是自然经济条件下,以分散的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为主要结构的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社会分工不发达,农民的家庭生产是按照自然分工、男耕女织的自给性的生产。产品主要在家庭内部分配和消费,产品不是商品,这就限制了他们与外界的交流、交往活动。而且由于是在狭小土地上的十分辛苦的简单再生产,这也使他们生产和生活是按照传统经验的简单地重复,使他们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狭隘和固定化,并局限于家族、乡里之间。即使居住在城市里的地主,也力图实现自给自足的消费生活方式,大多不在城市中购粮,而是把农村中收上来的实物地租的粮食,运到城内供自家食用,甚至肉、菜、水果及衣用皮毛等物,也多由租种自己土地的农户供给,《红楼梦》中对此有生动细致的描绘。一些地主官僚上层社会人士,也把“树之谷,艺之麻,养有牲,出有车,无求于人。”^①作为价值取向,为此甚至让自己的妻女也要亲自缝制衣服。这种自给性的消费,由于农业生产力提高缓慢,直到八十年代初,仍占相当大的比

^① 柳宗元:《送从弟谋归江陵序》。

重。1980年农民的自给性的生活消费品,仍占14.6%,其中食品自给占68.9%,燃料自给占49.6%。^①

其次,表现为职业生活的封闭性。传统社会中的职业结构相对固定。自周代起就实行士、农、工、商的“四民不迁”的国策,春秋时管仲治齐又提出士、农、商“不可使杂处”(即在居住上也划开各自的住区,以免见异思迁和便于家世传业。^② 职业结构的固定化,避免和减少了社会流动,也使人们的职业生活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到了秦、汉特别是宋以后,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职业结构的封闭性有了某种松动,一些地主、官僚兼营工商,少数农民家庭子弟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大多数农民依然世代为农,很少职业变动。由于传统社会重农抑商,形成轻商的社会心理,一些士人甚至退休的官吏,也宁愿为农,不愿为商。所以,从整体上看,职业群体间相对封闭。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所有制”和城乡隔离的户籍制,也使人们的职业难以流动,这是人所周知的了。

再次,表现为聚落形态的封闭性。传统社会的广大农村,是按血缘系统聚族而居的,同一祖先所出的后裔,长期聚居在一个地区,成为一个宗族聚落,直到今天,从张家村、李家庄等名称仍可看出。随社会的发展变动,也逐渐出现不同祖先后裔杂居的聚落形态。这种聚落中,可能有两姓或三五姓杂居,但一姓一村者依然很多,有些诸姓杂居的较大的村庄,也必然会有一个或几个居统治地位的大姓,甚至小城镇也往往如此。聚族而居,使家族、宗族、同姓内部凝聚,但对外则封闭。正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所言:“同姓则亲之,异性则疏之,同姓则相攸,异性则不恤。于是两姓相斗,两姓相仇。”

再其次,表现为封闭型的社会文化心理。由于中国封建辽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形成一种以天朝大国自居、以传统的伦理文化自诩、严“华夷之辨”的心理。古代就把中国统治不到的地方称之为“化外”,即尚未被中国文化同化之地。并且解释华夏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这种“华夷之辨”久而久之成了一种沉重的社会文化心理负担,形成了一种近代难以吸收、消化现代工业文明的封闭的心理机制。不仅如此,封闭型的社会文化心理还表现为:在长期的宗法文化的浸淫和封建专制统治下,人们往往被禁锢在“正宗”、“正统”之中,不敢在思想上越“正宗”、“正统”的雷池一步,从而把“正宗”的经籍中的教导,看作是千古不变和不可逾越的教条,以此来禁锢自己的言行和生活方式。

综上所述,传统社会生活方式,是以固守传统、固守传统的社会价值系统、固守狭隘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联系、固守狭小的生存空间、拒斥一切外界新鲜事物为特征的封闭型的社会生活方式。

向现代社会生活方式转型,必须打破这种封闭型的社会生活方式,形成面向广阔的社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断扩大生活空间、不断吸收新鲜事物的开放型社会生活方式。

人类早期,氏族、部落只能与相毗邻的氏族、部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与交往,包括交换、交战和联姻。正因为这类联系和交往,才形成和发展了人类社会。但是,当时的联系和交往,很大程度上受地理环境制约,而且限于人自身的发展水平,其范围和方式都极其有限和比较简单,加之,狭隘、强烈的氏族认同观念,使人类难以形成开放的生活方式。后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打破地理环境这个天然的封锁线,各个地区、国家、民族之间,越来越广泛地进行各种联系和交往。但是,在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条件下,这种联系和交往还有很大

^① 《中国社会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86页。

^② 《管子·小匡》。

局限性,社会生活方式还是封闭型而不属于开放型。然而,人是群体的人、社会的人,人的本性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只是由于人自身和社会发展的局限,才形成相对封闭型的生活方式。但即使在封闭型社会生活方式时期,人类也趋向于不断扩大对外联系与交往,历史表明,这种联系和交往,大都会给社会带来繁荣,也给人们生活带来生机,我国汉、唐时期就是如此。明后期、清的闭关锁国,则造成了我国历史性的衰退、落后,给人们造成诸多苦难。要摆脱这种落后和苦难,就要实现现代化,变封闭型生活方式为开放型生活方式。因为,随着世界市场和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体系的形成,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国家已不复存在,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依靠自给自足而不与任何国家发生联系。而且,把自己与世隔绝,就无法实现社会和人自身的现代化。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也使开放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和必然。现代科技,使整个世界互通信息,现代化的传播媒体,可以穿过一切封锁;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可以超越任何高山大海的阻隔,新型飞机使人们一天之内到达世界任何地区。这样,今天的世界已成为开放的世界,全球已成为紧密联系的大聚落,即人们常说的“地球村”。全球向中国开放,也要求中国向全球开放,要求我们的生活方式由封闭型转变为开放型。而开放的生活方式,也必将使人在不断吸收、融合各种外来文化过程中日益全面地发展,使人成为高度文明的现代人。

三、由僵固型转变为不断变革型

传统社会生活方式,是节奏缓慢、世世代代极少变化的生活方式。这是因为传统社会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发展缓慢的、自然经济的简单再生产的农业社会。农民(以及手工业者)生产经营狭小,工具、技术落后,资金有限,力量单薄,经不起天灾人祸。这就使他们易于墨守成规,恪守祖训,老老实实在地靠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模式生产和生活,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安于过低水平的“太平日子”,从而缺乏革新、创造精神。而且,在传统的伦理规范和陈规陋习的束缚下,生活方式的任何变革,都会被认为是违背祖训、逆伦悖理,难以被族人接受。这就使他们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按照陈规旧习,过着平静、保守、凝固、僵化、毫无生气的不断重复的枯燥无味的生活。

现代社会的不断变革型生活方式,是与上述传统社会的僵固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生机勃勃、不断进步的生活方式。

现代化极大地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改变了传统的社会价值系统,使人们在生活领域也不是以守旧而是以求新为价值取向。在现代社会,生活方式日新月异,成为一种常态;生活方式僵固不变,被认为是异常,这是人们生活价值观的巨大变化。锐意求新、不断变革,表明人的生活态度积极向前,永不满足现状,不断向更高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平前进;也表明主体的潜能不断发挥,努力追求自我的不断完善和人与社会、自然的日益和谐地发展。

现代社会,是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它也必然要求人们不断变革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为生活方式的变革创造条件和外部驱动力。

首先,要求人们不断变革生活方式,是与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和知识信息迅速增长分不开的。我们曾经常常听到过“知识爆炸”这个词,有的人对此还有异议。但是,所以称之为“爆炸”,这是由于20世纪60至70年代,世界上的发明和发现,超过了以往两千年的总和。如果往前追溯,现代化初期的19世纪,人类知识每五十年翻一番,到了20世纪初,每10年翻一番,20世纪70年代,每5年翻一番,20世纪80年代,每3年翻一番。70年代以来,每年全世界出版图书

50万种,平均每分钟出1本新书。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知识,过4年就要有50%老化。这就促使人们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不断获取新的信息。新的知识结构和新的信息,必然导致人们生活价值系统、生活方式的不断变革。当你获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更能保障你的健康或能够提高生活质量的话,你怎能不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呢?

其次,这是与科技革命导致经济迅速发展、生活资料不断更新换代分不开的。现代化过程中,经历了三次产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其标志是发明和应用蒸汽机为机械动力,使劳动生产率成倍地增长。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的、以发明和应用电动机的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使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随电能产量的增长,生产不断翻番,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以微电子技术应用于生产工具和管理技术为标志,它使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开始迈入所谓“后现代化”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革命,近几十年中,生产力出现了加速度地发展。例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80年代,由于依赖技术开放和重视教育,使经济增长了55倍。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使物质资料特别是工业产品不但品种日益丰富,而且不断更新换代,生活日用品尤其如此。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电视机发展十分迅速,由黑白电视机而彩色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又不断丰富品种,向微型和大型以及广角乃至高清晰度发展。又如,近二十年来,几乎在世界范围内,石英电子手表基本上取代了机械手表,而石英表又不断更新换代。使人目不暇接、层出不穷的新颖生活消费资料,必然诱使人们不断更新自己的生活方式。

再次,以贸易为龙头的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早期现代化的1913年,世界人均贸易额就比1800年增长24倍以上。1948—1971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率,据R·W·罗斯托《世界经济、历史和展望》中说为7.27%。加上现代交通工具、通讯手段的高度发展,特别是光电通讯技术、卫星转播及录像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更加便利,使文化交流、传播加速度地进行,文化具有的渗透性效应明显。全球的信息化环境,打破了一切封闭性的壁垒,这些也正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断变革,在日益发展的横向文化交流、融合中,将越来越形成高度文明、进步、新颖、科学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生活品位、生活质量必将不断提高。

由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向现代社会生活方式转型的上述三个方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只有全方位地实现这三个方面的转型,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不过,在上述三个方面中,由依附型转变为自主型最为重要,因为它是现代人如何生活的基本特征,是人的现代化程度的一个指示器。如果没有独立人格,不能自主的生活,无论如何是难以成为现代人的。开放和不断变革,是为了促进和完善个性化的、自主型的生活方式,是为了使人真正成为现代人。如果不是这样,开放和不断变革就毫无意义,这样的开放和变革就不属于由传统向现代生活方式转型的取向了。

由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转型,也可以从其它视角概括,如由贫困的生活方式向富裕的生活方式转型、由愚昧的生活方式向科学的生活方式转型。这种概括,当然不能说是错误的。因为,随工业化的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日益增大,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必然越来越富裕,甚至与传统社会人们生活水平有天壤之别。随科学的发展,人们生活方式也会越来

越科学、文明,人们的健康水平也会不断提高,社会人均寿命也将普遍延长。不过,贫困与富裕、愚昧与科学(作为形容词的科学),毕竟是一个相对的、不确定的概念,因为它的内涵是随社会进步与人们认识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上古人褐衣藿羹,比赤身裸体、茹毛饮血的远古人原始人富裕得多了;中古人较上古人、近古人较中古人,又都相对富裕。几百万年后,我们的后代子孙,又会讥笑今天发达社会中人们生活是如何匮乏了。

由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转型,也并不意味着生活方式的西化。现代生活方式,不等于西化生活方式。“西”是地理概念,“现代”是社会历史范畴,二者不应混淆。由于生态环境、生活条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也都有其自己的特质,同属现代生活方式,也会有千差万别的民族形式。在向现代生活方式转型过程中,我们所应参照的,不是发达国家现代生活方式的民族形式,而是现代生活方式的一般性的基本价值取向、价值准则。人类的生活方式有其共性,因此不但可以相互交往,而且可以通过交流,相互补益、涵摄。至于不同民族、国家如何实现社会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则要依据自己的条件。但是,如果无视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基本的价值取向、价值准则,则难以实现社会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上述的自立、开放和不断变革,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三项指标。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方式转型有了巨大进展,但用上述三项指标特别是作为现代生活方式基本特征的自主型生活方式来衡量,则这一转型尚处于初期阶段。

责任编辑:范广伟

张黎群总主编《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丛书》等著作出版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长,张黎群总主编《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丛书》第一批四种已由重庆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它们是:

△康树华主编、张晓秦副主编《青少年犯罪研究十年》1994年6月出版。全书22万字,定价6.90元。

△刘成根主编《挑战与抉择——青少年犯罪社会学新探索》1994年1月出版。全书18.4万字,定价4.50元。

△戴宜生著《治安策论》1994年6月出版。全书12.6万字,定价4.50元。

△杨若何、周路主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论》1994年1月出版。全书24万字,定价6.70元。

(张)